《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五十六期（民國一〇七年十月），177-202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DOI: 10.6276/NTUPR.201810_(56).0005

評 Alexander Broadie, *A Hi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曾怡嘉*

摘　要

蘇格蘭哲學與思想史近年為英語學界之新興研究領域。身為該領域之先驅、蘇格蘭啟蒙研究首屈一指的學者，亞歷山大・布洛迪有鑑於此趨勢，以本書叩問「何謂蘇格蘭哲學」之根本問題，並提供讀者一部十分全面的哲學史著。布洛迪成功地在書中兼顧歷史與哲學的深度，闡明蘇格蘭哲學的本質與重要性。他主張蘇格蘭哲學必須放入歷史脈絡之中研究，因為它並不僅是一項哲學的志業，更是數世紀以來凝聚蘇格蘭民族的文化傳統。若缺少過去思想家們齊力建構此一智識文化，近代以降的科學、文學、政治與文化發展恐怕舉步維艱。本文旨在評論《蘇格蘭哲學史》；同時概覽布洛迪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時從哲學到歷史的學術轉向。他對蘇格蘭哲學文化的投入值得當代歷史學家與哲學家關注，其作品開啟了思想史與哲學史對話的契機；文末將透過本書探討目前英語學界思想史與哲學史之互動關係。

關鍵詞：蘇格蘭哲學、哲學史、思想史、蘇格蘭啟蒙、休謨

---

* 曾怡嘉，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與大學學院政治思想史與思想史研究生。
投稿：107 年 4 月 10 日；修訂 107 年 9 月 26 日；接受刊登：107 年 10 月 2 日

A Review of Alexander Broadie's *A Hi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Yi-Jia Zeng*

Abstract

Scottish philosoph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have become the increasingly fashionable fields of academic studies. Alexander Broadie,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an accomplished scholar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returns to the basic question, namely, "what is Scottish philosophy?", and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 hi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Broadie successfully elucidates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Scottish philosophy both historic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He argues that Scottish philosophy must be studied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for it is not only a philosophical enterprise but also a persistent tradition which has united the Scottish nation for centuries. The advancements in science,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Scotland would be extremely unlikely, if not impossible, without such an intellectual culture established by thinkers in that tradition.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as a review of Broadie's *A Hi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in the background of his shifting academic interests from philosophy to history while he holds the professorship in University of Glasgow. His commitment to Scottish philosophical culture deserves the atten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for his work opens up a space for

* MA Candidate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ialogue betwee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 issue address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words: Scottish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tellectual history, Scottish Enlightenment, Hume

評 Alexander Broadie, *A Hi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曾怡嘉

書名：*A Hi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作者：Alexander Broadie（英）
出版社：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精裝本 2008、平裝本 2010）

壹、緒論

何謂蘇格蘭哲學（Scottish philosophy）？蘇格蘭哲學由誰來書寫？此二問題至今在英語學界仍是熱議焦點。思想史家和哲學家近年對蘇格蘭思想的研究興趣與日俱增，學者們的眼光從休謨（David Hume）及其所處的啟蒙時代，擴展至十九世紀以降的發展，牛津大學自 2015 年起陸續出版三冊哲學史——《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一）（二）》（*Scot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ume I&II*）與《十九世紀蘇格蘭哲學》（*Scottish Philoso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足見該領域儼然已成為新興的研究重點。亞歷山大・布洛迪在學術生涯中對蘇格蘭哲學傳統的叩問對於帶動此研究趨勢功不可沒。曾任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哲學系的邏輯與修辭學教授（Professor of Logic and Rhetoric）與歷史學

系榮譽教授，布洛迪試圖在這本著作中結合哲學和歷史學的視角回答上述二個問題。

一般而言，我們將某個哲學學派的名稱冠以國名或地區名稱時，大多意指該地區在特定時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或時代意義的思想，例如當我們提到希臘哲學，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柏拉圖（Plato）或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言及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即浮現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之名。有趣的是，儘管休謨名列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列，但我們似乎鮮少直接想到「蘇格蘭哲學」此一關鍵詞，反而更常稱他為「英國」哲學家；同時期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現代因《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而多以經濟學之父的盛名為人所知，但他真正傾注畢生心血、前後修訂五次之多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直到二十世紀八零年代後才逐漸為思想史家與哲學家所重視，而當代大多數的哲學史通論著作中將斯密當作哲學家看待者仍為數不多。上述所列舉的現象說明了儘管我們在學習或研究的過程中經常遇見這些頗負盛名的哲學家，但是我們並未明顯意識到其「蘇格蘭性」（Scottishness）。

蘇格蘭哲學一詞已經暗示了該哲學體系具有民族特性，既如此，由蘇格蘭作家所書寫的哲學，或是符合蘇格蘭特色的哲學應該都在此之列。換言之，蘇格蘭哲學並不僅是一個純粹地理區劃的產物，而是包含書寫者、被書寫的理論與學說所自成一格的「蘇格蘭學派的哲學」（Scottish school of philosophy），「既然有德國哲學、法國哲學、美國哲學，為何不能有蘇格蘭哲學？」（Broadie，2010：3）。然而布洛迪格外強調，雖冠以「學派」之名，蘇格蘭學派的一體性（unitary）並不是因為其中的成員共同支持特定的教條或恪守創派始祖的思想原則，而是由

於歷史發展的因素，使得這些思想家活動的社群十分緊密，同時代人在生活中大多是同事、朋友或師生關係，因此相互影響和挪用彼此的觀念經常發生。（Broadie，2012a：24-26）有鑒於蘇格蘭哲學的歷史性格，布洛迪的寫作便以歷史為經、哲學家為緯，建構屬於蘇格蘭自身的哲學史。

本文並不期待對整本書進行通盤評論，將先大致說明全書的章節安排，再對書中值得注意的觀點加以評析，同時透過本書的研究方法與寫作旨趣反思當前英語學界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與哲學史關係如何。筆者亦希望透過評論本書提升「蘇格蘭啟蒙」（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以及蘇格蘭哲學研究在國內學界的能見度，布洛迪作為該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其人及其學術成果值得關注。

貳、各章概要

本書討論的範圍橫跨了從中世紀至二十世紀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誠如布洛迪於導言中所說，無法涵括古往今來的所有蘇格蘭哲學家，因此他僅能介紹最能夠彰顯蘇格蘭哲學特色的思想家。布洛迪主要的研究領域為中世紀哲學（聚焦於知識論、邏輯與修辭學）和啟蒙運動，大致涵蓋了本書討論的年代範圍。他的研究特殊之處在於以蘇格蘭視角切入這兩個時代的思想發展，早期作品如《喬治・洛克特：晚期經院邏輯學家》（*George Lokert: Late-Scholastic Logician*）和《約翰・梅爾的學圈：宗教改革前蘇格蘭的邏輯與邏輯學家》（*The Circle of John Mair: Logic and Logicians in Pre-Reformation Scotland*）發掘中世紀哲學罕為人至的蹊徑。1990 年代以後，布洛迪專注於蘇格蘭啟蒙之研究，且能發現他對於蘇格蘭哲學傳統的思考漸趨成熟，出版《蘇格蘭哲學為何重要》（*Why Scottish Philosophy Matters?*）等書。約莫於此時，布洛迪或許從蘇格蘭

啟蒙智識文化的研究中獲得啟發，認為光以哲學研究本身仍不足以為蘇格蘭的特殊性辯護，因此在論著中逐漸增加歷史學的比重，我們能於2000年以降出版的作品明顯感受到他的學術轉向，從諸如《蘇格蘭啟蒙：歷史民族的歷史時代》（*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Historical Age of the Historical Nation*），以及其所主編的《劍橋蘇格蘭啟蒙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之中廣邀思想史學者如哈孔森（Knud Haakonsson）、貝瑞（Christopher Berry）和史都華（M. A. Stewart）等人撰文可見一斑。布洛迪近年的作品將眼光從蘇格蘭本身拉至更宏觀的視角，討論蘇格蘭與法國啟蒙的關係，從十八世紀歐洲史脈絡之中更能凸顯蘇格蘭哲學傳統獨樹一格。由布洛迪的學術背景可見本書是其漫長學術生涯累積的成果，更反映出一位人文學者畢生的追索。

然而，誠如布洛迪多次強調，蘇格蘭哲學並不是僅止於蘇格蘭啟蒙的思想，而是從中世紀起就對整體西洋哲學史的發展有重要貢獻，書中第一位介紹的思想家即約翰・鄧斯・司各特斯（John Duns Scotus），[1]儘管更早的哲學傳統可能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聖維克多的理查（Ricardus de Sancto Victore Scotus）。司各特斯出生時蘇格蘭尚未有大學成立，因此他自1270年代末起在牛津大學受教育。布洛迪雖稱司各特斯為第一位蘇格蘭哲學家，然而在十五世紀大學紛紛成立後，蘇格蘭哲學才開始蓬勃發展，（1990：2；2010：7-8）且最初三所大學——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格拉斯哥大學和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有十分緊密的學術圈，思想交流之蓬勃不輸巴黎、牛津或劍橋。往後數世紀，這些蘇格蘭的大學對哲學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十八世紀的格拉斯哥大學與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是啟

[1] Duns 為其姓氏，而 Scotus 則來自拉丁文的 Scotia，意指他來自蘇格蘭。然而學界習慣以 Scotus 稱之，而非其姓 Duns。

蒙思想家的重鎮。蘇格蘭的大學在當時便已經相當國際化，因此也使得蘇格蘭哲學極早就染上歐陸哲學的色彩，在本書的第三至五章之中可見十五世紀以降，除了以約翰・梅爾（John Mair）為首的學圈之外，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humanism）傳入，伊斯蘭學者的翻譯和著述同時盛行於蘇格蘭的智識界。布洛迪指出，蘇格蘭哲學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對外來思想的接受度頗高，且對古典學術興趣濃厚，在十六世紀末出現的「蘇格蘭亞里斯多德主義者」（Scottish Aristotelians）便是一例。（2010：93-97）

儘管布洛迪想要導正啟蒙運動在整體蘇格蘭哲學史上鋒芒過頭以至於其他時期受到忽略的現象，（2000：1）仍然無法忽略蘇格蘭啟蒙的重要性，足足花了四個章節的篇幅討論其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美學、心靈哲學等範疇的思想。以往學者多將法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當作蘇格蘭啟蒙之父，[2]主因在於他的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理論、美學、效益（utility）思想對休謨和斯密等主流的啟蒙哲學家影響深遠，他也首先倡議人天生有親社會性（natural sociability）

---

[2] 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本文對哈奇森的著墨稍嫌不足，並建議能由哈奇森的愛爾蘭身份與蘇格蘭性對話、亦能由他對康德批判前期的影響顯示出蘇格蘭啟蒙與德國之連結。筆者認為審查人之見相當有理，然而，對於哈奇森是否有「愛爾蘭性」（Irishness），筆者認為仍有商議空間。若深入其生平，哈奇森雖出生於愛爾蘭，但成長於蘇格蘭新教（Scottish Protestant）家庭，而在 1711 年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就讀，在西姆森（John Simson）門下接受準備成為蘇格蘭長老教會牧師的學術訓練，同時亦師從卡麥可（Gershom Carmichael），學習以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為主的自然法學說。完成學業後，他曾短暫返回愛爾蘭任教於長老教會的學校，期間交往的文人是以莫斯沃（Robert Molesworth）為首的學圈，該學圈以沙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和洛克（John Locke）等英格蘭人的思想見長。可見哈奇森的學術養成以及後來的研究著述都使他遠離愛爾蘭的身份認同。且若要檢視他是否展現「愛爾蘭性」，或許我們要考察愛爾蘭思想流變中是否有類似蘇格蘭哲學傳統的發展？足以自成一格的特色為何？這方面恐怕非本文篇幅能處理。筆者未多加評論哈奇森的其他原因在於本書第六章第六節對哈奇森的專論聚焦於美學思想與知識論，布洛迪的解說已相當完善，筆者為了專注於蘇格蘭哲學傳統進入啟蒙極盛期的動態過程，故不深入細節，僅扼要點出他在道德哲學方面的貢獻，同時也希望順應布洛迪在書中的主張——改正過去早期蘇格蘭啟蒙研究獨尊哈奇森之現象。

之說。（Robertson，2015：56-57；Campbell，1982）[3]然而在第六章，布洛迪顯然略微修正上述觀點，指出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哈奇森、格斯姆・卡麥可和喬治・坦堡（George Turnbull）三人共同將蘇格蘭推入啟蒙的年代，且在道德哲學和美學領域的貢獻方面平分秋色。

蘇格蘭啟蒙約莫於 1750 年進入全盛期，本書的第七至九章即介紹了當時最重要的哲學家與學派。第七章討論休謨的知識論、情感主義、道德哲學、美學，且不可避免地提及他與斯密的友誼，這使讀者能平順地進入下一個斯密的專章。第八章完整而清晰的呈現斯密思想的全貌，著重於《道德情感論》之中的同情（sympathy）、公正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正義以及其他德性（virtue），亦未疏漏當時盛行的臆測史學（conjectural history）或階段論（stadial theory），[4]並略提了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上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本章對斯密道德自然主義（moral naturalism）的討論展現了休謨對其思想的影響力，且觸及近年頗受關注的斯密宗教觀議題，（Hill，2001）布洛迪同意當前學界共識認為斯密在這方面比休謨謹慎許多，（Harris and Tolonen，2015）故能順利覓得教職，但其著作中指稱的神極可能只是泛稱、並非專指上帝，換言之，身為修辭學教授的斯密僅是工具性地使用「神」一詞。（Broadie，2010：217-218）第九章內容圍繞著常識學派（school of common sense）的四位哲學家，布洛迪指出該學派的成員頗難界定，他認為應有十二位。[5]常識學派處理的議題在布洛迪眼中是最能反映蘇格蘭哲學特色的，

---

[3] Sociability 原意為形容人善於交際的特質，筆者沿用陳正國教授的翻譯，請參考陳正國（2012：795）。

[4] stadial theory 一詞出於學者波考克（J. G. A. Pocock），階段論主張人類社會發展需經歷漁獵、游牧、農業、文明社會的階段，與斯密同時的思想家如威廉・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和亞當・佛格森（Adam Ferguson）等多有關發。（Pocock，2005：258-362）

[5] 十二位哲學家為：Adam Ferguson, George Campbell, James Beattie, David Fordyce, James Oswald, Lord Monboddo, Dugald Stewart, Alexander Gerard, Lord Kames, John Millar, Thomas Brown,

然而筆者認為本章的各節安排有失衡之嫌，湯瑪斯・里德（Thomas Reid）就有四節之多，其餘則是凱姆斯勳爵（Henry Home, Lord Kames）、喬治・坎貝爾（George Campbell）、杜格爾德・史都華（Dugald Stewart）各一節，然而亞當・佛格森僅被放在史都華該節之中討論，身為最有蘇格蘭性的思想家，（Hill，2017：3-7）佛格森在該哲學傳統中的重要性應予以提升，這部分將在後續進一步說明。

蘇格蘭啟蒙橫跨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對國內外在各學科領域之中都有深遠的影響，布洛迪在第十章進入十九世紀哲學前，反思了同為近年學界熱門議題：蘇格蘭啟蒙是否有終點？結束於何時？[6]部分學者認為大約結束於 1850 年代，更精確而言是在威廉・漢彌爾頓（William Hamilton）及其門生約翰・法瑞爾（John Ferrier）的時期，因為他們的哲學開始走向一種截然不同的柏拉圖主義（Platonism）。布洛迪並不認同，並指出以此論斷蘇格蘭啟蒙結束者是將哲學這一個學科當作啟蒙運動的全部，如前述，整個啟蒙運動涉及的領域涵蓋政治、科學、歷史學等，因此在布洛迪眼中，蘇格蘭啟蒙時至今日仍方興未艾。（2007：219-222；2010：301-304；2012b：370-385）本章指出十九世紀的新發展在於心靈哲學成為主流，哲學家關注的議題如意識（consciousness）和個人唯心主義（personal idealism），代表人物除了法瑞爾，還有亞里山大・班恩（Alexander Bain）與安德魯・賽斯・普林格派特森（Andrew Seth Pringle-Pattison），他們的研究仍不脫經驗主義的方法。十九和二十世紀

Thomas Reid.

6 過往對啟蒙運動是否有終點的討論多針對法國啟蒙，蘇格蘭方面則是頗新穎的議題。2017 年 11 月 22 日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思想史教授理查・華特摩爾（Richard Whatmore）的就職演說題目即「蘇格蘭、歐洲以及啟蒙運動的終結」（Scotland, Europe and the End of Enlightenment）。華特摩爾教授主張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知識份子普遍認為歐陸的啟蒙運動失敗了，並將眼光投注到蘇格蘭，對於該地在思想界榮景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亦能穩定發展，與歐陸形成對比，蘇格蘭因而也成為歐洲人重建政治秩序的取經之處。

的哲學家特色之一在於都不斷反思他們的上一個世代，「蘇格蘭啟蒙有何成就」以及「蘇格蘭哲學是什麼」等問題已見於當時的著作，尤其是第十一章介紹的第一位哲學家諾曼・坎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有大量相關論著。在二十世紀中葉，學者如約翰・帕斯莫（John Passmore）對當時哲學研究的論斷是：唯心主義（idealism）在蘇格蘭特別佔有支配地位。布洛迪認為該主張有過於武斷之嫌，（2010：325）二十世紀哲學家們除了延續十九世紀的心靈哲學研究，在知識論也有不少成果，史密斯、約翰・雷爾德（John Laird）、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等亦於愛丁堡大學形成以實在論（realism）見長的學圈。

參、蘇格蘭哲學的身份認同

若稍加回顧布洛迪個人的學術史，便能了解他何以如此重視蘇格蘭哲學。蘇格蘭哲學的重要議題大致有五：自由意志（freewill）、神恩（grace / providence）、人性科學（science of man / human nature）、常識學派、休謨的思想；若從歷史分期觀察，哲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則落在中世紀全盛期（high middle ages）、前宗教改革（pre-reformation）和啟蒙運動。從布洛迪 1990 至 2000 年代的著作中亦可發現他在處理蘇格蘭哲學時游移於歷史學和哲學之間，且如前一節所舉，大體而言早期作品哲學性較高，而中晚期作品則有愈來愈多歷史書寫，本書以及 2012 年出版的《合宜的連結：蘇格蘭啟蒙與法國的關聯》（*Agreeable Connexions: Scottish Enlightenment Links with France*）即應證了此一學術轉向。在寫作手法上，本書的章節是以人物為中心，布洛迪習慣先花一至二節的篇幅簡述該哲學家的生平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再開始討論其思想的重點。這種安排的優點在於能夠緊扣布洛迪所要凸顯的「蘇格蘭人的論述」（Scots

tongue），（1990：12-19）即從蘇格蘭視角的歷史進入哲學思想的討論。然而這種做法有其難度，主因在於由蘇格蘭人自身建構的蘇格蘭歷史和思想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以前並不常見、甚至有些哲學家在當時的蘇格蘭智識界根本名不見經傳、或近代早期之後的人們無法閱讀中世紀以拉丁文撰寫的作品，（2000：2-3）因此仍多仰賴英格蘭史家的記載。由本書的參考書目可以發現，布洛迪為了平衡蘇格蘭與英格蘭歷史論述，儘量採用與該哲學家同時代人或哲學家的自述，減少了以「他者」之口來建構蘇格蘭思想家自我認同可能產生的問題。

一、常識學派與蘇格蘭啟蒙的哲學

常識學派經常被視為蘇格蘭哲學的代表。（Graham，2015：303-304）蘇格蘭啟蒙的思想並非憑空產生，布洛迪在本書的工作即是論證從中世紀以來便存在著一個蘇格蘭自身的哲學傳統，十八世紀思想的碩果要歸功於該傳統豐富且源遠流長，以及當時在英吉利海峽兩岸智識界形成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哲學家們相信，將人視作自然的一部份，便能以科學方法來探究人性，人性科學的研究即是蘇格蘭啟蒙哲學的特色，常識學派從里德開始即在這個議題上與休謨對話。常識學派本身反映了蘇格蘭哲學缺乏基本信條的特質，其成員的多樣與多變，也使他們在當時並不以一個學派自居，不過布洛迪歸納出五項常識學派的思想核心：（一）人的心靈之中存在一個不證自明的基本結構，是心靈活動的基礎（二）在此結構上的心靈活動會依循一定的基本原則，也因此常識學派基本上拒絕休謨的懷疑主義[7]（三）相信神恩賦予人心靈的力量

[7] 筆者感謝審查人援引比提（James Beatie）之語提點，更有助於理解「常識」（common sense）的本意。比提在《論真理的永恆與本質》（*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Immutability of Truth*）書中將常識理解為：「所有人，或至少是絕大多數人類相近的行為方式」（acting in a similar manner upon all, or at least upon a great majority of mankind）而這種近似或共通之處，即來自心

（mental power）（四）採用培根式（Baconian）或牛頓式（Newtonian）的方法研究人性科學（五）強調心靈之中意識所扮演的主導角色。簡言之，常識學派相信人是積極行動且自由的主體，心靈是產生自我概念的源頭、具有認知外在世界的能力，不僅擁有也能掌控自我的意志。（Broadie，2010：236-238、246-270；Lindsay，2012）

就以上對常識學派的基本論述而言，布洛迪以里德為本章之首確實得宜，但若欲凸顯該學派的蘇格蘭性，將佛格森置於介紹史都華的章節之中、僅以三頁的篇幅討論顯然不足。佛格森的心靈哲學、神學和方法論上不僅符合前述常識學派的思想核心，（Hill，2006：ch3-5）更重要的是他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可謂展現蘇格蘭哲學的重點：（一）對古典學術的投入（二）遠超過其他哲學家的蘇格蘭性（三）重視經驗與科學的研究方法。蘇格蘭最著名的文學家之一華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曾將佛格森譽為他們時代最讚賞的天才，且他的哲學和歷史作品展現了「古典、優雅、高度的理性以及緻密的細節。」（Hill，2017：1）

布洛迪在此章節中將佛格森定位為影響史都華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並肯定了佛格森採用培根式的經驗主義科學方法是為里德所接受的。（2010：286）接著以佛格森對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盧梭（Jean-Jacque Rousseau）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的批評為例，說明其重視經驗的方法如何操作。佛格森對文明社會起源的研究在某方面而言是與哈奇森的親社會性對話，然而與休謨或斯密採用的道德情感理論路徑不同，佛格森從觀察歷史切入，發現在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之中人們是自然而然聚集成群體，進而發展出軍隊與政治組織，故公民對其所屬政治社群的忠誠與熱情是在這種自發性的過程之中培養出來，使他們自然會關心同胞的幸福。佛格森駁斥霍布斯和盧梭假設的自然狀態是人

靈的力量依循感官結構中的基本法則所形成的共同認知。

類社會的起源，因為缺乏歷史先例（historical antecedent）當作經驗證據（empirical evidence）。（2010：286-287）布洛迪的解釋十分有意思：佛格森認為霍布斯筆下的自然狀態之中，人人交相戰的情況下不可能有餘裕組織社會，且霍布斯的政治社會是建立在契約論的基礎上，自然人何以有能力從事如此複雜的工作，若如此，表示自然人已經有共同的語言，但在戰爭不休之下，這些原始人類怎麼可能已經發展出能夠溝通並締約的複雜語言？這是否暗示之前還有前自然狀態存在，但出於某種原因使原有的法律和執法機構崩毀而退化到自然狀態？至於盧梭主張自然人幾乎與動物相去不遠，他們光是要生存就已經自顧不暇，何以有餘裕發展道德情感去關心其他的自然人？（Broadie，2010：287；2012a：184-186；Ferguson，1995：8）佛格森拒絕兩位哲學家契約論式的政治理論，（Hamowy，2005：172）在《文明社會史論》（*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以歷史經驗證明了人天生的社會性促使他們自發組成社會，布洛迪這種解讀的方式導向的結論是「社會狀態即自然狀態」（2010：287），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從自然的親社會性導向組成政治社群正說明了亞里斯多德著名的政治學主張：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Aristotle，2016：1253a1-3；2009：1097b9-11）。簡言之，綜觀佛格森的社會發展理論以及後來的《羅馬共和的進步與終結史》（*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我們能合理地認為佛格森的政治哲學帶有亞里斯多德式的世界觀，也能顯示佛格森對古典學術的投入或許同時代思想家無出其右。[8]

---

[8] 布洛迪在《合宜的連結：蘇格蘭啟蒙與法國的關聯》第六章點出佛格森的共和主義大致服膺亞里斯多德於《政治學》（*The Politics*）卷一的主張，卻未詳加論述；波考克在《馬基維利時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第一卷第三章亦將公民人文主義者（civic humanist）的共和主義思想歸於亞里斯多德傳統，佛格森即是其中一員。（Pocock，1975：49-82）本段評論目的僅在於呈現布洛迪此一特殊見解，而筆者認為事實上佛格森的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屬於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傳統，這點需另

佛格森以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y）否定了近代早期政治哲學盛行的契約論觀點、並建構其道德哲學基礎，一如布洛迪暗示多數蘇格蘭哲學家都不是契約論者，更讓我們注意到這種研究方法在蘇格蘭哲學中重要的地位。經驗研究方法擴及的範圍除了社會發展和臆測史學，還有政治活動、經濟行為與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休謨和斯密等一般不被歸類為常識學派成員者事實上也都會使用，因此亦有學者主張蘇格蘭啟蒙是社會科學的濫觴。（Bryson，1945：239）值得注意的是，由經驗研究建構出一種有別於歐陸和英格蘭的道德哲學，佛格森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曾在《羅馬共和的進步與終結史》之中表示古典學的價值歷久不衰，因為它展現了人類文明的輝煌，提供我們理解人性的途徑。（Ferguson，1783：3；Broadie，2012a：168-171）換言之，對佛格森而言，研究人類社會的用意在於從經驗中為當代人提供行為準則的指導。（Graham，2015：313）另一例為佛格森在 1776 年美國獨立革命時與英格蘭思想家理查・普萊斯（Richard Price）的筆戰，兩人都援引孟德斯鳩（Montesquieu）自我辯護，卻導向對革命正當性完全不同的解釋，主因即兩人建構道德哲學的方法有天壤之別。（Hamowy，2005：159-166）佛格森主張，道德準則必須放在歷史脈絡之中來研究才可靠，（1769：2）過去的歷史對諸多道德準則的檢驗遠比個人心靈結構來得全面，也因此在歷史層層累積中獲得的準則讓人類的道德進步成為可能。

二、佛格森和休謨的蘇格蘭性

若把蘇格蘭哲學家們一字排開，佛格森和休謨應該會位居「蘇格蘭性」光譜的兩端，主要的原因是兩人成長背景不同，[9]以及他們從事哲學

為文處理。

[9] 佛格森的背景與當時其他思想家相當不同，他自幼成長於蘇格蘭高地（Highland）的伯斯郡

書寫時設想的對話對象有所差異。但這種對比並不表示我們要在兩人之間擇一肯定其蘇格蘭性、而將另一人剔除於蘇格蘭哲學的範疇外，布洛迪在本書將兩人都納入討論範圍的作法，事實上已經肯認了兩者都具備足夠的蘇格蘭性，無論他們是否自認如此。

休謨的身份認同至今仍為學界所樂道，他有生之年似乎極力想擺脫身上有關蘇格蘭的標籤，（Harris and Tolonen，2015：163-164）亦為其濃重的口音所苦。相較於他的文人朋友們例如斯密、佛格森、法官約翰・荷姆（John Home）等人，休謨並未出任地方政府公職或大學教職，對1707年議會聯合（the 1707 Union of Parliaments）後失去議會的蘇格蘭如何重整政治力量、以促進地方進步發展的議題也不甚熱衷，[10]儘管他是許多討論這類議題學會（society）和俱樂部（club）的常客。（Harris，2015：16-18）然而他終其一生只有少數時間離開蘇格蘭的居所，且與他共同討論哲學的朋友們都是蘇格蘭的知識份子，無論是在愛丁堡、格拉斯哥或亞伯丁的文人圈，休謨都處於核心的位置，他的思想也是在這種

（Perth），前後就讀於聖安德魯斯大學和愛丁堡大學，是蘇格蘭啟蒙哲學家中唯一精通蓋爾語（Gaelic）者，因此在1743年被任命為高地軍團的隨團牧師，又於1754-1756年至歐陸壯遊，回國後才定居愛丁堡，先是繼休謨後出任律師圖書館（the Keeper of Advocates Library）館長，並自1759年起在愛丁堡大學教授自然哲學、心靈學（pneumatics）與道德哲學等課程至1785年退休。關於佛格森的生平與影響，請參考陳正國（2008：188-189）。近年英語學界對於佛格森的高地氏族背景是否直接影響其思想的形成多有討論，但尚未形成共識，學者們驚訝於他在高地居住多年，居然能迅速融入低地的（愛丁堡）文人圈，且相當擁護漢諾威王室（House of Hannover）；在政治與道德思想方面，佛格森體現高地精神，強調生命力、高貴、自我犧牲等德性，同時又提倡古希臘羅馬的道德思想。相關討論見Hill（2016：ch1）和Brewer（2008），Hill和Brewer分別代表了正反二方的意見。

[10] 關於十八世紀俱樂部與學會的研究是蘇格蘭啟蒙的重要歷史學議題，原因在於愛丁堡議會因為〈1707聯合法案〉（1707 Acts of Union）而併入倫敦議會後，蘇格蘭失去地方立法機構，且處於政治與社會英格蘭化（Anglicisation）的過渡期，俱樂部與學會幾乎成為地方議會的替代品，致力於農業改良與哲學思辨的討論活動，學者如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稱之為「類政治」（para-political）或「類議會」（para-parliamentary）的功用。（Phillipson，1983：201；Kidd，2014：176-178）有趣的是，哈里斯（James A. Harris）認為，休謨對這些地方政治、學會和俱樂部的改良活動不太積極，是他對於爭取大學教職失敗也不太在意的原因，哈里斯筆下的休謨是純粹的「文人」（man of letters）。

環境下醞釀成熟。因此，在哲學史上，似乎無法將休謨徹底從蘇格蘭哲學抽離，一旦冒險為之會產生以下問題：首先，如布洛迪在本書所要建構的，蘇格蘭哲學傳統源遠流長，啟蒙思想家是在此基礎上發展他們的理論學說，休謨的思想無法與此傳統切割。再者，蘇格蘭啟蒙的思想有很可觀的一部份是奠基於休謨以及他對其他知識份子的影響而發展，（2000：91-93）尤其是常識學派，例如里德曾在給休謨的信中寫道：「您友善的對手坎貝爾博士、傑拉德博士還有格列高里博士[11]崇敬地向您致意。三位都是這個小小的哲學學會[12]的會員，我們十分感謝您的著作帶給我們的樂趣……如果您再也不寫道德政治（morals politicks [*sic*]）或形上學，恐怕我們就會損失很多討論主題了。」（Broadie，2010：235；Wood，2003：31）若把休謨抽離蘇格蘭哲學傳統，恐怕常識學派會截然不同、蘇格蘭啟蒙亦難以存在。回到布洛迪的基本論調：蘇格蘭啟蒙並不是蘇格蘭哲學的全部，（2010：369）卻是蘇格蘭哲學的重要標誌。因此若缺少休謨，將動搖蘇格蘭哲學的基本結構。

休謨寫作《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定位頗明確，他想要發展與同時期蘇格蘭哲學家不同的思想，且志在將其思想傳遞給全歐洲的讀者。當代研究者經常發現休謨在著作中營造一種作者熟讀歐陸哲學作品的形象，例如他在為推廣《人性論》所寫的《人性論摘要》（*An Abstract of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小冊裡特別強調其中應用的笛卡兒思想，而《人性論》本身儘管引注不多，但顯然休謨採取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立場是研讀桂鳩亞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馬列奇塢（Nicolas de Malézieu）、拉羅希福可（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

[11] 前二位皆為布洛迪所列舉的常識學派成員。此處的格列高里博士應是大衛・格列高里（David Gregory）。

[12] 里德所指為「亞伯丁哲學學會」（Aberdeen Philosophical Society），又名「智慧俱樂部」（the Wise Club）。

等作家的結果。換言之，休謨在書中傳遞的哲學形象是兼具歐陸和英國的，但他仍是在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洛克、巴克萊（George Berkeley）、哈奇森等人——之中研究人性科學。（Harris and Tolonen，2015：167-168）

事實上，休謨的背景也讓他很難完全不受蘇格蘭的哲學傳統影響。1720 年代初，他在愛丁堡大學研讀古代語言、邏輯、形上學、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時或許已經接觸了喀爾文教派的士林哲學（Calvinist scholasticism）和牛頓的科學，然而早年最常與他討論哲學的是他的親戚——常識學派的凱姆斯勳爵，以及時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席（Chair of Moral Philosophy）的哈奇森。（Broadie，2010：147-148）他與凱姆斯勳爵在 1730 年代通信頻繁，約莫此時，休謨到法國遊歷，接觸了一些歐陸哲學家例如皮耶・貝爾（Pierre Bayle），《人性論》的寫作橫越這段期間，同時受到歐陸與蘇格蘭思想影響是意料之事。學者們注意到休謨的懷疑論思想似乎經歷了漫長的形成過程，在愛丁堡學習的喀爾文教派思想以及在法國期間，皮耶・丹尼爾・于特（Pierre Daniel Huet）和尼可拉・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啟發休謨思考宗教與懷疑主義的相容性。（Broadie，2012：ch3；Harris and Tolonen，2015：169）

或許我們能從道德哲學的角度看見休謨的蘇格蘭性其實比他自己想像得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從哈奇森到斯密的道德情感理論，特別是斯密的《道德情感論》之中充滿休謨式（Humean）的論述，儘管斯密對休謨思想修改不少。以公正旁觀者理論為例，哈奇森和休謨在討論「旁觀者」時立場相近，旁觀者的角色在於督促人從事合宜的行為以展現德性，而休謨對德性的定義是：凡能給予旁觀者值得讚許的愉快情感之行為就是有道德的。可見斯密的公正旁觀者事實上是內化了休謨上述定義而創造出個人內在的道德守門員。（Broadie，2010：200-201）顯然 1750 年代起，斯密和休謨的長遠且深厚友誼讓他們有十分頻繁的思想交流，休謨

甚至指定斯密為遺囑執行人，放心將手稿託付給他。布洛迪仍要提醒讀者，兩人關注的哲學議題相同、思想也有諸多雷同，但斯密對休謨道德哲學的修改程度不低於接受程度，例如同情理論之中，斯密就不認為激情（passion）的作用如休謨所言的高，而要視旁觀者所處的情境而定，因此斷言同情是由激情而生並不完全正確。（2010：204-205）至此我們能論斷，休謨的道德哲學相較於他的懷疑主義，的確有較明顯的蘇格蘭色彩，但也不能忘記蘇格蘭哲學的特色之一即對歐洲思想的接受與融合既快且多元，休謨在知識論和形上學方面展現的世界主義事實上在在顯示其蘇格蘭性。

肆、結論：反思當代思想史與哲學史研究之關係

布洛迪在本書之中透過建構蘇格蘭自身的哲學傳統，不僅回應了本文開篇所拋出的兩個問題——何謂蘇格蘭哲學以及由誰來書寫之——亦藉由蘇格蘭哲學傳統的形成說明了當代思想史與哲學史的關係。換言之，布洛迪追索蘇格蘭哲學身份認同的過程展示了哲學與哲學自身歷史的不斷對話，而正是深入思想史的研究得已讓我們瞭解該對話如何發生，這就要仰賴探究該哲學思想的體系是在什麼歷史條件與社會環境下形成的。正因為充分體認到哲學與歷史的密不可分，布洛迪才會採取「以建構蘇格蘭哲學傳統來標舉蘇格蘭哲學特殊性」此一途徑；也因此他能在本書結論斷言：「蘇格蘭哲學是一份未盡的志業，而這本書是一份當前進度的報告。」（2010：369）

強調哲學傳統的存在與重要性，事實上肯定了「若欲瞭解該哲學思想，則必須先認識哲學史」的主張。然而，當代哲學，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學界，自二十世紀起便對於哲學史的地位論辯已久，最常見的反方說

法主張學習哲學史無助於我們瞭解哲學思想本身或獲得真理。（Sharff，2014：1-32）學者如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進一步指出，學術分工（academic division of labour）助長此說，研究的分科與有時過度刻意在各領域之間劃清界線反而拆毀了議題的內部結構，以致於我們對思想去脈絡化的解讀提高了理解不全、甚至曲解的危險，以古希臘思想為例，嚴守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的分類界線，結果就是以為我們可以在不研究亞里斯多德政治思想的情況下理解他的倫理學。（1984：31-39）但不可否認的是，亞里斯多德的政治思想是當時社會環境與歷史的共同產物，哲學家永遠都會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宣稱能背棄自己所屬的歷史脈絡以尋求真理將把自己推向一種智識生活分裂的窘境。（Sharff，2014：xi）就此而言，布洛迪的看法與麥金泰爾一致，如我們在書中能發現他反覆強調蘇格蘭哲學是建立在悠遠的歷史發展之上而形成自成一格的傳統，換言之，所有學科的知識基礎若是建立於時序發展的成果上，就永遠無法否認自身學科歷史存在之必要。在此意義下的歷史具有兩層意義：首先，經歷過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之中各種變遷的考驗所存續下來的原理或法則是可靠的，一如我們在前文討論佛格森的道德哲學時所言，佛格森主張必須在歷史脈絡下理解道德準則；第二，歷史本身的層累性得以作為知識發展成果的載體，人們才能有依據來評估科學、藝術、思想等方面發展的程度，且能避免前車之鑑，如麥金泰爾所言，當前自然科學與哲學的成就都需要科學史與哲學史來評價才知道我們已經走了多遠，（1984：47）且有前人的成果，就可以不用每開始一項新研究就要從零開始，在過去和現代知識成果的合作下，人類文明才有進步的可能。（Broadie，2007：46-47）

無論何種學派的哲學家應該都不否認他們探究的議題是亙古即有的問題，而在他們之前已經有無數人嘗試提供解答。既然如此，透過歷史

的角度，我們可以知道不同時代人回答問題的方式受到該時代處境的影響，例如什麼是好的政治制度？在古希臘和十八世紀的英國，思想家們會有不同的答案，欲從分歧的視角中理解思想家們為何會給出那些他們自認最適切的解答，就有賴從過去的文本來透視這些有人類歷史以來即存在的問題，此時歷史學的專業技能格外重要。然而，當代學者懷疑自 1970 年代以降英美學界的哲學史教育是否真的能讓學生和研究者具有足夠的語言和史學技藝（linguistic and historical skills），（Catana，2015：139）即能不犯時代錯置（anachronism）的毛病來解讀哲學文本之中的歷史建構，換言之，對整體學術發展有正面意義的研究是在當代意義上處理議題並提出有益於當代的回應，因此如果又以當代眼光看待過去的哲學思想時，非但無法完全解決前人思想之弊、甚至無法察覺自己有重蹈覆轍的可能。強調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無不可，但在當代的謬誤上同時產生過去與現在的錯誤，比退守在單一時代之中犯錯更不值得。然而，儘管思想史家由於史學的訓練而能避免上述危險，但當代英美思想史學界在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主導下，以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的方法詮釋哲學文本時有過於窄化的傾向，具體而言，都聚焦於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政治哲學。此外，如上一段落中麥金泰爾所言的學術分工現象，讓思想史家的機構基礎薄弱，分散於歷史系、政治系、哲學系和語言學系，大學之中專門的思想史課程為數不多，一如哲學史家所開設的哲學史課程日益減少。（Catana，2015：138-140）

蘇格蘭哲學，特別是蘇格蘭啟蒙，即是思想史與哲學史合作的好場域。就布洛迪的學術背景而言，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哲學系和歷史系，讓我們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哲學與歷史學的深度兼備，換言之，本書在闡述蘇格蘭哲學的發展時，並不只是依照時序排列各個思想家或學派，而能深入彼此之間的思想關聯、對後世哲學的貢獻以及他們思想的歷史

意義。同時，本書涵蓋了中世紀與當代的哲學發展，也顯示布洛迪在採用脈絡主義的書寫策略時，避免了前述的眼光狹隘問題，並示範這種寫作用以討論其他時代的可行性。這種書寫方式可行，很大的程度也是因為蘇格蘭哲學本身的特性，如布洛迪反覆強調，蘇格蘭哲學是在長久深厚的歷史發展下所孕育出的文化傳統，因此討論蘇格蘭哲學並不僅止於形上意義，在實際的歷史發展上，從事哲學的風氣也是凝聚蘇格蘭民族的重要因素。這點在十八世紀特別明顯，若缺少政治上 1707 年英蘇合併為聯合王國後蓬勃的智識生活，以及蘇格蘭啟蒙運動中休謨、羅伯森和佛格森等人將歷史奉為顯學，恐怕無法有今日的哲學成果。（Broadie，2007：43-46）總而言之，布洛迪長久的學術關懷自二十世紀末出版的《為何蘇格蘭哲學重要》、《蘇格蘭哲學的傳統》（*The Tradition of Scottish Philosophy*）兩部作品中對蘇格蘭哲學的本質與歷史意義之叩問，在本文評論的《蘇格蘭哲學史》之中展現豐富的成果——蘇格蘭哲學之所以成其所是，來自於特定歷史條件與悠遠思想傳統的支援，使其能獲得「北方的雅典」之美譽。布洛迪的作品也顯示了對於人類思想議題的關懷在本質上並沒有科際界線的藩籬，思想史不是僅退守在解釋過去的智識生活之中思想家們如何以語言與行動介入實質發生的歷史事件，哲學史亦非僅是呈現哲學學說的流變或典範的轉移，兩者的合作將對人文學科的發展帶來更多正面貢獻。[13]

[13] 致謝：筆者對兩位審查人的肯定與建議深表謝忱，並感謝主編與團隊之協助使本文得以見刊。本文寫作期間，感謝臺大哲學系徐學庸老師跟筆者討論古典學之於蘇格蘭啟蒙的影響，並提供許多古代政治思想的補充。感謝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陳禹仲評論初稿。最後，特別感謝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正國老師，因為他長久以來的指導，筆者的佛格森研究才有今日。

參考文獻

陳正國（2008）。〈宗教與世俗的辯證——佛格森論歷史與自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2：187-233。DOI: 10.6342/NTU201802611

--- （2012）。〈陌生人的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779-835。DOI: 10.6342/NTU201802598

Aristotle. (2009). *Nicomachean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6). *The Politics*. In J. Barnes (ed.), *Aristotle's Politics: Writings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ewer, John D. (2008). "Adam Ferguson's Epistolary Self." Eugene Heath and Vincenzo Merolle (ed.). *Adam Ferguson: A Reassessment*, Volume I (7-22).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Broadie, Alexander (1990). *The Tradition of Scottish Philosoph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2000). *Why Scottish Philosophy Matters*. Edinburgh: Saltire Society.

--- (2007).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Historical Age of the Historical Nation*. Edinburgh: Birlinn Ltd.

--- (2010). *A Hi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2012a). *Agreeable Connexions: Scottish Enlightenment Links with France*. Edinburgh: John Donald.

--- (2012b).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 M. Devine and Jenny Wormald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Scottish History* (370-3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563692.013.0020

Bryson, Gladys (1945). *Man and Society: The Scottish Inqui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37/13558-000

Campbell, T. D. (1982). "Francis Hutcheson: Father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R. H. Campbell and Andrew S. Skinner (eds.).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of Scotland* (169-185). Edinburgh: John Danold.

Catana, Leo (2015).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ir Genesis and Current Relationship."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129-140). London: Wiley-Blackwell. DOI: 10.1002/9781118508091.ch10

Ferguson, Adam (1769). *Institutes of Moral Philosophy*. Edinburgh: A. Kincaid & W. Creech.

--- (1783). *Hiso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Vol. 1*. Edinburgh: W. Strahan & T. Cadell.

--- (1995).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Fania Oz-Salzberger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Gordon (ed.) (2015). *Scottish Philosoph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9560684.001.0001

Harris, James A., Tolonen, Mikko (2015). "Hume In and Out of Scottish Context." Aaron Garrett and James A. Harris (eds.). *Scot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ume I: Morals, Politics, Art, Religion* (164-1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9560677.003.0006

Harris, James A. (2015). *Hum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mowy, Ronald (2005).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Freedom: Adam Ferguson*

and F. A. Hayek.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Hill, Jack A. (2017). *Adam Ferguson and Ethical Integrity: The Man and His Prescriptions for the Moral Life*.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Hill, Lisa (2001). "The Hidden Theology of Adam Smith."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8, 1: 1-29. DOI: 10.1080/713765225

--- (2006). *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Dordrecht: Springer.

Kidd, Colin (2014). "The Phillipsonian Enlightenm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1, 1: 175-190. DOI: 10.1017/S1479244313000371

Lindsay, Chris (2012). "Hume and Reid on Newtonianism, naturalism and liberty." I. Kasavin (ed.). *David Hume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191-208).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MacIntyre, Alasdair (1984). "The Relationship of Philosophy to Its Past." Richard Rorty, J. B. Schneewind and Quentin Skinner (eds.). *Philosophy in History* (31-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 11625534.005

Phillipson, Nicholas (1983). "Adam Smith as Civic Moralist." I. Hont and M. Ignatieff (eds.).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79-2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625077.008

Pocock, J. G. A. (1975).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5).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ume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1316134542

Robertson, John (2015). *The Enlightenmen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rff, Robert C. (2014). *How History Matters to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DOI: 10.4324/9781315885674

Wood, Paul B. (ed.) (2003).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omas Rei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